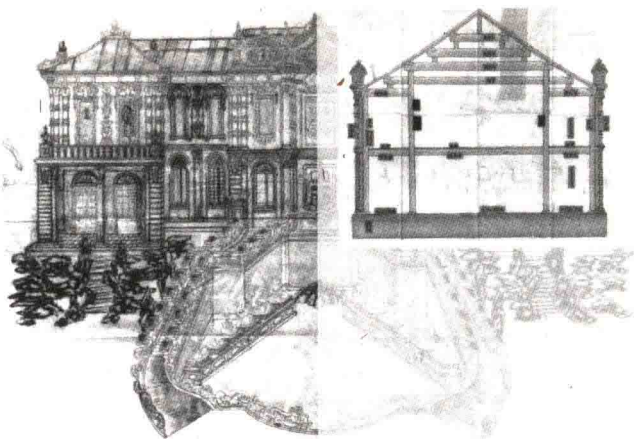


话语·观念·建筑研究论丛



探求一种“中国式样”：
早期现代中国建筑中的风格观念

IN SEEKING OF A CHINESE SHIYANG:
THE CONCEPTION OF STYLE IN EARLY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E

王颖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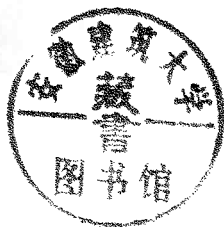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话语·观念·建筑研究论丛

探求一种“中国式样”： 早期现代中国建筑中的风格观念

IN SEEKING OF A CHINESE SHIYANG:
THE CONCEPTION OF STYLE IN EARLY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E

王 颖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求一种“中国式样”: 早期现代中国建筑中的风格观念 / 王颖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 8

(话语·观念·建筑研究论丛)

ISBN 978-7-112-18349-4

I. ①探… II. ①王… III. ①建筑风格—研究—中国 IV. ①TU-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3973 号

责任编辑: 何楠

书籍设计: 张悟静 康羽

责任校对: 陈晶晶 党蕾

话语·观念·建筑研究论丛

探求一种“中国式样”: 早期现代中国建筑中的风格观念

王颖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京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5½ 字数: 320 千字

2015 年 10 月第一版 201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ISBN 978-7-112-18349-4

(2753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对研究方法的自觉是现代研究区别于传统学术的重要标志之一。近现代建筑史研究经前辈开创至今逾六十载，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学术传承脉络。各位前辈在研究方法和资料搜集等经验性研究方面做出了源远流长的非凡工作，泽被和激励着后辈去努力。

本书以鲜明的方法意识为线索，选目的共同特点，是以话语和观念研究作为研究方法，尝试将建筑史、观念史、社会史融合，倡导多维视角下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和本土化视角的现代中国建筑史研究。

立场与问题意识

建筑历史的研究是否是一门科学？在历史面前，“我”能够做些什么？这个看似宏大的问题对确定本论丛的立场和研究问题关系重大。对于本论丛来说，历史研究不但是“揭露真相的面纱”，还原历史的真相，更是为历史寻找一种新的解读和诠释。这种诠释由来自当下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性思考所驱动和制约。

本论丛的研究基于思考“如何理解近现代建筑话语乃至建筑文化的剧变”这个问题，试图与历史文献和当代研究文献进行对话。

话语与方法意识

本论丛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尝试将建筑史放入思想文化史的大语境中考察，将关键词和话语分析作为建筑史研究的手段。

“话语”不只是写在文献报刊中的那些语言文字，而是受社会行为的驱动，并且对社会性实践产生影响的能动性力量。“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索绪尔）话语的意义不在于去寻找说这些话的人是谁，而是确认，在某个历史的时刻，某些话在某些场合下，被说出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话语，就是行动。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说，就是做。”话语方法试图强调话语本身的实践性力量，而不仅是作为社会现实的被动反映。

现代与本土化视角

近现代中国的“现代”，毫无疑问与西方紧密相连。在整体来自西方移植的建筑学科中，中国问题研究的西方中心倾向是与生俱来的。然而，这也正是今天反思它的原因。中国语境下的“现代”，不应该采用某一个西方标准，而应该在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衡量和界定，即使学习西方一直是我们的目标。另一方面，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本土文化的传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本土文化内部发展的需求和动力是决定外来影响作用方式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

总之，话语分析与建筑文化史叙述的方法相结合，外在的社会影响与建筑学科内在发展相结合是本论丛的研究策略：将语言放在它的文化、技术和社会环境中加以研究，用观念史的方法拓展建筑史研究的视野和维度。

20世纪对于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社会还是文化来说，都是一个彻底变革的时代。就建筑而言，这也是一个脱胎换骨、与千百年历史彻底断裂的时代。然而，“现代”与“历史”的关系，又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始终无法摆脱、深陷而无法自拔的语境。于是，“现代”与“复古”，这一对在西方20世纪建筑历史中的对立面，在中国却有了更为复杂和矛盾的关系。纵观现代中国的建筑史，如果说有哪一种建筑风格最能代表20世纪中国建筑发展的丰富与艰辛、痛苦与成就的话，我想首推中国传统复兴风格建筑。与19世纪的欧洲古典复兴风格一样，这种建筑风格的出现与民族国家的独立、民族主义思想的崛起，试图以古喻今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然而与之不同的是，伴随着中国的这一建筑现象，同时又凝聚着除了政治含义之外的更丰富的建筑现代化的内涵。这种传统复兴思潮，从一开始就已经同时带上了既反映政治上的文化复兴，又体现脱胎换骨、追求现代化的现代意识的烙印。传统复兴，这个在西方语境中“现代性”的对立面，在中国却又有着强烈的“现代”意识。在现代建筑学刚刚开始被移植的中国，传统的以木构为主体的建筑体系如何转化为以现代的材料、结构和技术体系的方式来建造，传统的建筑文化如何现代化以进入世界现代建筑历史的主流，这都是贯穿20世纪的历代建筑前辈们念兹在兹的深刻主题和沉重历史挑战。也正因是这样，中国传统复兴风格建筑，也许是现代中国建筑历史上最值得研究的建筑现象之一。

正因为如此，学者们从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傅朝卿、杨秉德、赖德霖等一大批从事近代建筑研究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建筑现象进行了研究和解读。30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在众多学者的推动之下逐渐深化，从比较传统的风格和实物研究逐渐推进到涵盖国家政治制度、中西建筑文化交流、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建构等多视角的诠释。单单是关于这种建筑现象的概念，就包含中国固有式、中国古典复兴建筑、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中国式样/风格等等多种不同的表述。

本书是作者王颖博士在历时五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的结果。王颖博士的研究独辟蹊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更深入的推进。作为她的导师，我为她的研究成果感到骄傲。王颖博士的研究至少在三个方面有自己的特色：

首先，她没有停留在对建成实物本身的风格描述和设计分析上面，而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从思想层面进行剖析，试图思考在中国20世纪反复出现而一直得不到真正解决的问题症结所在，并最终从对历史文献和实物的研究发现了“式样—民族性”这一思维定式，这使她的研究和反思具有了面向当下实践的价值。

其次，她不满足于通常的仅仅从西方建筑影响的角度来理解，而是试图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寻找外来影响相结合的要素，以此来解释这种建筑现象的成因。书中的主要观点是，传统观念在中国建筑现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隐蔽而关键的作用，这一点有新意而又合情合理，对相关的研究不无启发。

最终，基于上述两点考虑，她选择把研究的切入点落在了“式样/风格”这一对似乎比较抽象的概念上，从词汇的变化这一语言现象入手，结合历史背景的树立和建筑案例的深入分析，比较恰当有效地抓住所讨论问题的本质。在我看来，这也是这一研究最大的亮点和贡献。

王颖博士有志于学，学风扎实又勤奋不辍，在2009年同济大学博士毕业之后，经过在香港中文大学

从事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又远赴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继续深造，研究的课题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此次书稿经过修改完善之后，能够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话语·观念·建筑研究论丛”中最终出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衷心祝愿她在未来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的进步和进一步的成果。

伍江

博士 教授

同济大学 副校长

2015年7月31日

本书摘要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竞赛和实施方案所引发的争论之中,建筑的“中国性”问题是全社会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书认为,从建筑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的产生肇始于20世纪初,而要真正理解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则需要从中国本土建筑文化传统、西方建筑学思想传入以及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建立三条发展线索来思考。

本书的论述从上述三条线索出发,将“式样”这一源自中国古代的概念在近代建筑话语中的含义转变作为观察的切入点和论述的枢纽,通过比较式样与来自西方的“style”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凸现中国近代建筑思想观念的独特性。

建筑思想观念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建成的建筑作品或文本层面,而应把建筑师的具体设计实践和建筑话语都提升到思想层面来思考。本书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建筑师在思考民族性问题时的思维定势的产生和影响,重新梳理中国近代民族式样的产生过程,并试图说明,在民族主义思想涌动的近代社会条件下,“中国式样”是随着民族意识的产生和源自西方的风格意识的影响在中国逐渐确立的。虽然这一过程并非仅仅是在建筑领域内,而是包含了服装、艺术、社会文化、国货运动和展览会等一系列的全方位行为,但是它对中国建筑现代化甚至直到今天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以至于成为制约建筑发展的桎梏。

本书试图从观念层面揭示出影响了中国建筑师一个世纪的“式样—民族性”的思维定势,并通过剖析这种思维模式在近代具体的文化、社会语境中实践的复杂性,最终希望从中西建筑文化历史的联系和差异中对影响中国整个20世纪建筑历史的“中国式样”问题做出新的解释和分析,进而从中找到突破这种思维定势的可能路径。

目录

丛书前言

序

本书摘要

引言	001
----	-----

第一章 民族意识与中国建筑	009
---------------	-----

1.1 中国中心观的解体与民族意识的产生	010
1.1.1 “天下”与“中国”	010
1.1.2 中国中心观念瓦解	012
1.1.3 中国民族意识的产生与“中华民族”的建构	014
1.2 “中国建筑”观念的形成	015
1.2.1 “中国风”(Chinoiserie)	016
1.2.2 “中国建筑”形象的形成和转变	021
1.3 “民族性”与建筑	024
1.3.1 改造“国民性”与“新民族性”的追求	024
1.3.2 建筑作为“民族性”的表征	025

第二章 中国建筑成为一种“风格/式样”	029
---------------------	-----

2.1 “风格”/“Style”与“式样”	030
2.2 “风格”(Style)	033
2.2.1 “风格”的历史发展	034
2.2.2 “风格”在布扎(Beaux-Arts)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039
2.2.3 对风格的反思和批判	045
2.2.4 宾夕法尼亚大学对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影响	047
2.3 “式样”	050
2.3.1 古代与器物制造相关的“式样”概念	050
2.3.2 工匠的建造行为中的“式样”	053
2.3.3 外观的模仿:近代“式样”概念的延续	058
2.3.4 舶来的新意味与“外观”的民族性	060
2.4 “中国建筑”开始成为一种可选择的“风格/式样”	061
2.4.1 传教士与“中国风”的回传	062

2.4.2 “中国式”：中国建筑作为一种风格	069
第三章 “风格/式样”与民族国家的建构	071
3.1 政府对“民族式样”的推动	072
3.1.1 民族主义：中国与德国	072
3.1.2 建筑与规划的国家风格	074
3.2 大众文化中的中国式样	084
3.2.1 “中式服装”	084
3.2.2 国货运动和国货展览会	087
3.2.3 “中国馆”	094
3.3 作为民族主义者的中国建筑师	101
3.3.1 民族主义与中国建筑师	101
3.3.2 中国建筑的“风格”史重构	105
第四章 “中国式样”的多种探索	109
4.1 中西之间：创造“中国建筑式样”的多种途径	110
4.1.1 中西与体用：“中国建筑”，一个还是多个？	110
4.1.2 折衷与现代：建筑师与社会风尚的多元性	112
4.2 作为整体风格的“中国式样”	119
4.2.1 原点：南京中山陵	120
4.2.2 里程碑：南京原中央博物院	130
4.3 作为局部装饰的“中国精神”	137
4.3.1 “中国精神”与现代建筑	138
4.3.2 “外向”模式：以原上海市图书馆为中心	140
4.3.3 “内向”模式：以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与原国民大会堂为中心	144
4.4 作为平面化装饰艺术的“中国美术”	148
4.4.1 “中国美术”与装饰艺术	149
4.4.2 实践：西湖博览会建筑	151
4.5 “中国固有”，不仅是“式样”	156
4.5.1 建筑实践中的三种“中国建筑”	156
4.5.2 平面模式中的“中国性”	157
结语：超越“中国风格”	163
图片目录及来源	175
附录：1890s~1940s “中国式样”建筑列表	183
参考文献	232
致谢	238

① 原文见：<http://www.sciencenet.cn/htmlnews/2008/7/209395.html>。

② 在这些意见中，ABBS论坛上网友的“十九问”最具有代表性：

为什么“东方之冠”被当作中国馆主体建筑的构思主题？……为什么一个巨大的斗拱的简化“造型”被当作中国馆建筑形态文化表达的手段，并可以形成“传统建筑的当代表达”？如果斗拱作为中国传统木建筑的构造元素表达了传统建筑工匠对材料的理解和运用以及木制建构文化的创造，那么这种把握材料、建造与形式关系的智慧和创造性可以被一个模仿的象征符号表达吗？如果斗拱从构造为主转向装饰与礼制等级为主、构造兼有的历史演变恰恰契合了从建筑的自主性到建筑的政治符号化之转变过程，那么今日将斗拱彻底转变成象征符号是不是这样一种“建筑文化”的终极表现？从古代设定檐下斗拱的数量和组织以适应巨大的屋顶转变成当下中国馆斗拱“造型”本身的巨大，从精巧独特的木构技艺转变成20世纪中期就已经被日本建筑师探索的“现代简约”形式，这种“传统建筑的当代表达”显现了什么样的“中华智慧”？最后，在我们展示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之前，或许需要回到问题的起点：谁的生活？谁的城市？

显然，这些对中国馆的批评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建筑本身，而是直指建筑背后的意识形态含义。然而对建筑本身的不满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不满由来已久。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开幕，又一次把世人的目光吸引到这座“要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传达中华智慧”^①的中国馆上，对建筑师所说的“……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何谓中国特色；二是如何体现时代精神”，一时间聚讼四起，争议不断。^②

这已经远不是21世纪以来的第一次了。从国家大剧院到鸟巢、从水立方到CCTV大楼，每一次代表国家形象的建筑出现，不出意外地引起从专业人士到普通百姓的全面关注。然而这次与其他几次大部分建筑师喜欢、大部分公众不满的模式不同的是，这一次多数公众对这个建筑非常欢迎，而建筑师则基本都痛心疾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次世博会的中国馆都因为设计质量不高、设计人员专业水平较低甚至不具备专业资质而遭到建筑界的广泛诟病。在很多人看来，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的举行使我们获得机会在自己的国家召开世博会。然而，从中国馆方案的评选过程开始，关于设计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特别是方案选定后对它的批评更加尖锐。批评的意见包括几个方面：方案的原创性问题；“东方之冠”和世博会主题的关系；传统建筑形象和当代文化的关系。其中最突出的争议是，怎样才算表达“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气质”？如何“凝聚中国元素、象征中国精神”？中国建筑界追求了近百年的“中国建筑”如何能借助这百年不遇的机会得以实现并以此弘扬中国文化，成为问题的核心。在这样的思路指导下，评委会最终选出了具有强烈纪念性效果的综合方案。在之前国内的诸多大型项目，比如北京奥运会场馆建筑，都进行国际招标并放弃了对传统形式的追求的情况下，上海世博会项目中，如何体现传统却再次成为设计的目标。

回顾近代以来中国建筑的历史，20世纪一共有三次古代建筑式样复兴的热潮：第一次是20世纪30年代，由国民政府鼓励推动、留学美国受到学院派建筑教育归来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参与的“中国固有式”建筑实践；第二次是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下，以第一、二代建筑师为主的“民族形式”建筑活动；第三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新的民族形式建筑思潮。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在文化上融入世界，民族形式逐渐被“批判的地域主义”这一类较为温和的反民族主义的建筑思潮所代替，民族风格逐渐走向建筑界的边缘。但是，其中的建筑思想问题仍未得到有效的清理。这也导致时至今日，2010年世博会中国馆所引发的争论仍然陷入一种混乱的嘈杂之中。“传统/现代”、“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及其体现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中的“民族风格/现代风格”的对立仍然是争论的焦点。可见，寻求体现“中国民族性”的建筑风格至今仍是困扰中国一部分建筑师的问题。

那么，这一持续了上百年的问题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成为中国建筑师的主要焦虑的？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一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建筑师对民族

风格的探索？这些探索之间的区别和关系是什么？这些将是本书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概念、立场和方法

关于中国建筑“民族形式”、“中国古典复兴建筑”的讨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中心和重点，几代学者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地研究。早在20世纪40年代，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中就有中国近代建筑的章节，其中专门讨论过“民族复兴式样”的建筑现象。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梁先生的学生刘先觉先生、吴光祖先生就开始了近代民族复兴风格建筑的系统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建筑史研究在汪坦先生等学者的推动之下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历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研讨会和各种类型的学术会议中，大量的学术成果已经积累起相当丰厚的基础。其中关于民族形式的研究更是重中之重，当代最重要的近代建筑史学者都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或者专著。本书的研究就是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之上展开的。

在正式讨论这些研究之前，首先需要解释本书标题中所采用的一个基本概念——“式样”。

对于中国的民族形式建筑，有诸多不同名称。20世纪30年代时使用“中国固有式”^①，而当代的近代建筑史研究学者则使用了不同名称，比如，伍江教授在《上海百年建筑史》中使用“中国古典复兴”，郑时龄教授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中使用“传统建筑复兴与中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说法，吴光祖教授在《中国近代建筑体系的形成与建筑艺术特征》一文中提到“传统复兴的中国式建筑”，杨秉德教授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中称“中国建筑民族形式”，傅朝卿先生的专著使用了“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的标题，赖德霖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称为“中国古典复兴式建筑”。

在这些名称中，分别使用“风格”、“形式”、“式样”、“式”来表示这种建筑的类别。但是，笔者发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文献中“风格”这个词很少出现，大量出现的是“式样”、“样式”、“式”等带有传统意味的用语。于是，经过详细的检索，笔者发现“风格”一词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内建筑界开始使用的说法，而在20世纪上半叶广泛采用的是“式样”（参见2.1）。那么，“式样”和“风格”的含义是完全一样、可以相互替换的吗？

今天，我们一般把近代建筑话语中的“式样”等同于“风格”，并且一般认为它和英文中的“style（风格）”是同义的。这样的做法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是，中国的式样之间的区别和西方不同风格的区分是性质相同的。然而事实上，在近代早期的中文文献中，“式样”一般是和建筑形式相联系，

① “中国固有式”的说法出自国民政府于1929年制定的《首都计划》。

而“风格”则更多的与文章、绘画的形式相联系。经过研究，笔者发现，这和古代建筑行业的文献中就有“式”、“样”的用法有关，近代建筑工匠和建筑师采用“式样”的说法，是中国本土建筑文化习惯的遗留和传承。

而且，进一步的研究证明，“式样”在近代历史中的变迁与中国人近代对建筑的理解变化直接相关，它既不同于古代的“式”、“样”，也不同于当代的“风格”，更不同于西方的“style”，而是结合了传统“式样”外观内涵与近代中国建筑师们西方留学带回来的“民族性和式样”等密切相关的内涵丰富的独特概念。

所以，“式样”的丰富内涵不但包含了中国建筑从传统向近代转变过程中的遗留和新变，同时还包含了留学西方的职业建筑师“风格”知识与一般民众“式样”意识之间的张力。可以说，它的传统—近代文化含义的变迁折射出近代中国建筑风格的发展，甚至直接影响了后者的方向。

于是，笔者认为：近代“式样”这个词的含义，是回到原初的语境理解中国近代建筑的有效突破点，更是理解文章开头提到的建筑外观民族性问题起源的关键。因此，本书特别采用了“中国式样”这样一种说法，从式样、风格、“style”的区别展开讨论。本书把近代的“式样”概念作为研究的核心和关键点，把它同风格、“style”概念进行区分，试图将其放在历史的语境下，思考建筑式样与民族精神或民族性之间关系的历史。

近现代以来百余年的“中国固有式”、民族形式、中国精神对建筑师的促进和困扰、理论与实践，都与建筑外观—民族性的思维定势密切相关。本书讨论的目标是讨论这个思维定势是如何产生、建立并且影响至今的。因此，本书的讨论核心范围主要确定在1900～1937年之间“中国式样”建筑的开端，从1900年“义和团事件”激发了西方传教士的教会中国化运动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式”教会建筑的迅速发展，到“中国固有式”建筑的探索被1937年的抗日战争爆发所终止。

显然，这个问题不是纯然的历史问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的目标和意义都应该有当代的指向和实践的维度。因此，与当代实践依然相关的“建筑—民族”思维定势的建立是本书特别关注的问题，思维定势的转变也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出路。本书的讨论不能仅仅局限在实物的层面上，对建筑孤立地进行讨论，而是要关心实物背后的思维、观念的世界。

在现有的研究中，关于建筑实物的研究在数量和深度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关于建筑思想的讨论相对较少。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关注的内容也开始逐渐由单纯的风格、实物的研究延伸到制度、技术和观念的全面探讨。2003年在南京召开的近代建筑学术思想的学术会议以及2005年在美国进行的第二届研讨会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集中的展现。这方面，几位中年学者的研究可以作为代表：赖德霖、徐苏斌、

赵辰、李士桥等，同时，几位学者又各有特色。

在关于“建筑—民族形式”的问题上，傅朝卿的著作《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二十世纪中国新建筑官制化的历史研究》迄今为止仍然是这个领域里面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他认为中国近代建筑中的古典式样，实际上并未构成严谨的体系或主义，无法按照西方分为“中国古典复古主义”、“中国古典折衷主义”及“中国古典装饰主义”三类，将其合在一起统称为“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并增加一种“抽象”的做法。他的研究在研究建筑实物的基础上，比较注重中国和西方的比较，在与西方建筑发展的比照下定位中国近代建筑的性质。他认为传教主义和民族意识形态共同导致了“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对“琉璃闪烁，画栋雕梁”的民族情结也有比较深层的原因，“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在这种建筑意象所构成的生活环境中，进而发展出对金碧辉煌古典式样建筑很难解释之民族情结。所以在中国迈入近代历史之后，这种古典式样的建筑仍然继续脱胎换骨地以新材料及新面貌出现，变成了一般人心目中概括的‘宫殿式’现代建筑。”^①

①傅朝卿：《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二十世纪中国新建筑官制化的历史研究》，台北：南天书局，1993：vii，1。

赖德霖的近代建筑史研究注重社会背景、社会史和文化史对建筑史的影响。他将“科学性”和“民族性”作为“近代中国的建筑价值观的两种取向”，认为“科学性”导致对传统建筑非科学性的否定和对西式建筑的崇尚，加之对建筑民族性的追求，对西方建筑结构技术和对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肯定产生了一种近代中国建筑中西结合的手法。

杨秉德先生注重近代化过程中文化的改变，他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中，把中西建筑文化融合的过程分成三个层面和步骤（器物、制度、思想）。他认为中国建筑师掀起的“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的创作热潮，与西方建筑因早期在教会大学建筑所做的探索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创作动机是完全不同的，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民族形式的探索和1915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所导致的“精神层面的文化嬗变”密切相关^②。他将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形式建筑分为三类：“套用中国传统宫殿建筑形式构成模式的整体仿古模式；在建筑整体采用西方近代建筑体量组合设计手法的基础上局部增加中国传统建筑屋顶或楼阁作为‘中国固有形式’标志的局部仿古模式；以及建筑整体采用西方近代建筑体量组合设计手法，局部施以中国传统建筑装饰的简约仿古模式。”^③

②杨秉德：《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96。

③杨秉德：《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94。

这些研究的共同之处是，中国的建筑学科普遍被认为是外来移植的产物。例如，赖德霖认为：“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中国建筑受到了西方建筑在结构、技术和形式诸多方面的影响而与传统营造方式分道扬镳，换言之，现代建筑学在中国的出现并非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外来文化移植的产物。”^④正如前面提到的诸多研究所证明的，外来因素的刺激确实是中国建筑现代化过程的主要推动力量。不过，本土文化因素同样在现代化过程

④赖德霖：《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15。

中起到了不可缺少的甚至更加根本性的作用。而这种本土因素的作用，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本书以“式样”这一带有鲜明本土文化特征的关键词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就是试图在中国建筑自身发展的线索里面认识中国近代建筑，而不是理解成外国学科移植。所以，与中国古代建筑相关的文献同样是一起讨论的材料。

20世纪中国建筑中的“复古”现象，现有的研究中已经讨论了很多，无论是对问题的描述、分析还是解决方案，都已经有了很多的尝试，但是似乎始终无法提出有效地走出困境的具体方法。虽然历史研究的任务并非直接为实践指明道路，但是作为面向当下问题的理论研究，始终让人觉得遗憾。笔者认为，无论是把中国建筑中的现象对等于西方建筑中的“古典复兴”或“新古典主义”或其他某个具体的建筑历史现象，都忽视了中国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都是简单地将建筑历史的发展过程理解成某种单线的进步史，认为中国是走在西方后面的，跟随西方走向现代建筑似乎是中国必然走向的一条道路。

今天，随着我们对西方建筑历史本身的了解逐渐深化，可以知道西方内部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但包括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差异，还包括同一民族在同一时代中所同时存在的不同甚至对立的建筑思想，我们在后文中的一些讨论中可以发现，西方建筑内部的差异和演化往往是造成一些历史变迁的重要契机，而这种差异是根源于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设想同样具有深厚文化基础的中国建筑传统轻易地转轨是不现实的，要想对症下药，诊脉是最基本的一步。这也是本书重视分析历史演变中本土文化因素作用的主要原因。

同时，正如刘禾新近的研究^①所揭示的，中国近代史中的很多问题，都只有放在更大的范围之内才能获得更好的理解。当代日本学者关于东亚建筑发展整体性的历史研究^②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本土意识的前提下，本书追求同时的世界性的视野。通过不同国家间的比较，相信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近代民族式样建筑的性质和特征。

本书最核心的部分不是实际建造出来的建筑，关键的是建筑师的思想。不仅仅讨论建筑是什么样，而且讨论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的结果又是什么。同时，另一方面，建筑实物是思想的载体，思想研究不能缺少以建筑实物研究为基础。本书希望在建筑案例研究方面作出一点尝试，针对以往研究往往仅从透视图和照片阅读建筑的做法，除了现场观察建筑以外，本研究注重对平面图和剖面图的仔细阅读。与实地探访不同，图纸是建筑师工作的对象，与在施工过程中可能遭到修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可能被多次改建甚至拆除重建的现存事物相比，图纸对还原建筑师的思想有着难以替代的重要性。通过阅读图纸，我们可以更加不受干扰地贴近建筑师的思维世界。

① Liu, Lydia He. *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比如村松伸在《建筑史论文集》上连续发表研究《东亚建筑世界二百年》。

内容与结构

如前所述,本书将“式样”这一源自中国古代的概念作为观察的切入点和论述的枢纽,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建筑师在思考民族性问题时的思维定势,重新梳理中国近代民族式样的产生过程,并试图说明“中国式样”是随着民族意识的产生和源自西方的风格意识的影响在中国逐渐确立的。在这个确立的过程中,三种因素的影响相互交织:一是源自于中国古代的“式样”概念对于大众思维观念的影响;二是来自于西方建筑学的风格概念对于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的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三是在民族主义和身份认同观念影响下,对于“中国建筑”的认识的发展变化。本书的论述就在相应的三条线索的交织中展开。

本书的讨论从影响中国一百多年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性追求开始。随着地理学知识的拓展以及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国作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从19世纪中叶开始逐步瓦解,中国不再作为“夷夏”对立的中心,而是开始以西方为典范创造中国的“民族国家”。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投入了孕育民族国家的启蒙事业,也开始了对于“民族性”的追求,而且影响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一直试图批评和改造中国民族性。这种对于民族性的情结在中国建筑师的身上同样延续近一个世纪,影响了20世纪的建筑理论和实践。

那么,对民族性的追求是如何同特定风格的探索联系在一起的?第二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文章回到近代建筑话语的具体语境中,去探讨“式样”在近代建筑文化语境中的意义。本书希望通过梳理“风格”、“式样”这两个概念的演变,指出它们对理解中国建筑的近代化过程尤其是传教士以及外国建筑师所创造的“中国建筑”如何被作为一种“风格/式样”而接受,具有特别的重要性。

西方的“风格”概念及其在建筑设计中的作用,影响了第一代归国建筑师的观念和实践,而从中国古代传统而来的“式样”概念,又为关于建筑外观形式的理解创造了普遍被接受的环境。一方面,中国工匠的建造行为和“对式样”的模仿,为“中国式样”在近代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土壤,也是传教士和西方建筑师创造的“中国式样”被广泛接受的深层原因;另一方面,中国建筑师所受的西方教育使得他们易于接受传教士和外国建筑师的视角。在这种情形下,第一代建筑师继续进行着“中国风格”的创造。

如何通过“式样”来体现民族性,何为“中国式样”?这一问题成为20世纪初从整个中国自民众到政府,乃至专业建筑师所追求的目标。第三章从三个角度分别分析“风格/式样”成为体现“民族性”的途径。它首先体现在民众的生活中,比如中式服装、国货运动及其展览会与展览馆,民族主义情绪下民众自发地参与是根本基础;对于政府来说,如何在国货

运动中突显和提升国家形象,以及如何呈现体现政府权力和威严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对于建筑师来说,他们如何认识并在设计中实现“风格”对“民族性”的体现,以及学术研究中通过“风格史”的写作来强化民族主义思想。所有这些,加深了视觉、外观和民族性之间的联系,强化了“式样”和“民族性”必然联系这一思维定势。

第四章将分别从三个方向入手,探索“民族性”诉求下的近代中国建筑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从现有研究中被多次讨论的典型的民族形式建筑南京中山陵、南京原中央博物院以及上海市图书馆出发,在这一理论前提之下,将以往很少被纳入民族形式建筑讨论的童寓的体现“中国精神”的“现代”建筑、刘既漂的“美术建筑”作为三种主要的探索途径进行平行比较和讨论。显然,虽然这三种不同的探索都未能超越“式样—民族性”思维定势,但是在努力突破原有的设计手法方面、对中国建筑文化资源的理解和采用方面各有不同,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设计模式。

除此以外,本书还试图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凸显出目前研究中通常采用的风格史研究和形式分类的局限性,并对以西方为标准评价中国建筑“进步”的方式提出质疑。虽然当时建筑师的确以“式样”为出发点进行设计,但是风格分类的方法无法凸现出中国近代建筑本身发展的独特性,对于中国近代建筑这种外来传入式的发展过程,“风格和进步”的叙述方式很容易不自觉地采用了一种西方中心的视角,而这恰恰是本书要反对的。第四章的最后,通过几个案例的比较,对以往建筑史研究中一些常见结论提出反思。

现今早已离开了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的语境,所以不能也没有必要延续当时对于“中国式样”的追求和想象。然而,面对困惑了中国一个世纪的“式样”和“民族”的追求与矛盾,如何可以超越式样的探索?上述的思维定势有怎样的局限?本书的结语部分简单回顾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到当前的建筑“民族性”实践的状况,分析这个思维定势引发的当代问题,继而通过回顾“风格/式样”问题在西方建筑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性,提出本书的主张:“民族性”与“式样”的思维定势是其主要的深层原因,要想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摆脱延续百年的思维定势的束缚,增强民族建筑文化的自信心,在更广阔的建筑学视野中寻求新的道路。